

■新作聚焦

范稳长篇小说《碧色寨》

一段被湮没的现代化历史

□贺绍俊

铁路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发展最为迅速的一项事业,我在读了范稳的《碧色寨》后,才知道中国在上个世纪初也曾因为铁路而引起世界的震撼,这就是修建穿越云南边境的滇越铁路。当时这条滇越铁路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并列被誉为世界三大工程。

碧色寨是滇越铁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车站,在范稳的描述中,可以想见当年这个车站非常繁华,也充满了异国的风情,生活在这里的法国人都有身处巴黎的感觉。当然这个名称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我对它同样也感到陌生,在未读小说前,我还以为范稳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乡村的故事呢,但是读完这部小说后,我忽然对这种陌生感有了种警惕。喜新厌旧似乎是人的天性,我们为京沪高铁上的风驰电掣而欢欣雀跃时,大概谁也不会联想起滇越铁路上曾经的辉煌吧。这两者之间相隔了太长的时间,人们不可能不把前者遗忘。所以我们可以将责任推给时间,时间是助长人们喜新厌旧的帮凶。范稳在小说中告诉我们,时间其实还是铁路带给我们的概念。在铁路到来之前,碧色寨的人们只有季节的概念,因此那位彝族最聪明的毕摩独鲁憎恨铁路,他留恋在季节中的生活,“季节让我们在一年中悠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间则让我们像猴子一样在大地上忙来忙去”。毕摩独鲁始终在与铁路作战,但人们都被铁路带来的新生活所俘虏,所以这是毕摩独鲁一个人的战争。毕摩独鲁的战争显然会以失败告终,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铁路如星罗棋布,然而,范稳却提醒人们,铁路上曾经发生过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或许我们即使坐在京沪高铁舒适的车厢里,也应该怀念这位曾与铁路作战的失败者毕摩独鲁,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而今天普遍存在的对曾经作为世界三大工程之一的滇越铁路的陌生感,其危险性就在这里。范稳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所以他坚持要以“碧色寨”为书名,他并非不知道这个书名丝毫没有市场的号召力,但他仍要努力以这个陌生的名字去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

铁路有一种很耐人寻味的寓意。我们常把中国的现代化比喻为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又何曾不是从铁路开始的呢?但铁路就像《碧色寨》所描写的那样,最初是由外国人强制性地建设起来的。小说一开始侧重讲述修建铁路的艰苦和血腥,这既是由云南险峻的环境决定的,也是由修建铁路的性质所决定的。它的性质在于,这是一条由殖民者带着扩张的愿望而修建的铁路,它其实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中国的现代化最初是由殖民化所启动的。正像碧色寨车站的站长弗朗索瓦对铁路的评价:“因为有了这条伟大的铁路,这里的生活如果不是全殖民化的,至少也是半殖民化的了。”当然,范稳并不是一位守旧者,他并不赞同完全站在前现代的立场来批判现代化的弊端,他始终是一位文化融合论者,在这一点上,他的《碧色寨》与他的“藏地三部曲”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也许是正是这一点,才会使得一条几乎完全被埋没的铁路勾起了范稳的写作冲动。因为这条铁路的修建和通车,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自然界的瀑布是由地理落差形成的,落差越大,瀑布就越是壮观,范稳则在碧色寨发现了曾经有过壮观的文化“瀑布”。也许可以说,《碧色寨》就是范稳用文字再现了这个文化“瀑布”的场景。铁路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庞然大物,而它的延伸之处则还处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仿佛是滚滚的河水突然跌落到幽深谷底,掀起了巨大的浪花。从第三章“四脚蛇年”开始,法国人在碧色寨为铁路修建了特等大站,作者为我们端上了正餐。“在碧色寨车站的洋人们开香槟庆祝时,寨子里的人彻夜未眠,每当他们要进入梦乡时,远处驶来的火车又将他们无情地赶出来”。在彝族人的眼里,火车就是地上的恶龙。但也正是在这样巨大的文化落差前面,我们才更清楚地发现,文化融合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起作用的。最先改变

了对这条恶龙态度的应该是彝族的土司普田虎,因为火车带给他的财富暴增。拥有铁路的法国人无疑带着文化的优越感,但事实上他们的灵魂也在异族文化的熏陶下悄悄发生了改变。因此,范稳更感兴趣的是法国人在跟随铁路进入碧色寨后所发生的变异。大卡洛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者强盗形象,他相信靠手棍和手枪就能解决问题。弗朗索瓦比大卡洛斯多了一层文明的外衣,因此尽管他与大卡洛斯怀着同一个征服的目的,但他认识到了“我们依靠强大的文明,很容易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很难征服他们的灵魂”。弗朗索瓦也许自己找到了征服彝族灵魂的途径,因为他将毕摩独鲁的儿子阿凸成功地改造成了火车上的一位机长,他甚至因此而颇有了成就感。但毕摩独鲁却是由于这个原因最恨弗朗索瓦,在他看来,是弗朗索瓦先迷惑了他儿子的灵魂,再夺走他儿子的命,即使弗朗索瓦救了他的命,也不能抵消他的恨,他最后亲手杀死了弗朗索瓦。连那位始终怀着真诚心愿去了解彝族文化的露易丝医生也无法明白这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倒是那位崇尚武力的大卡洛斯认清了这片土地:“火车也好,西方的生活方式也罢,或许可以给它带来某些改变,但这就像落在土地上的雨水,浸湿了它的表面,可能会催生出一些植物,太阳一出来,还是从前那个模样。”

我的思路仍然要回到“时间”上,因为这是当代作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无独有偶,范稳和阎连科在他们的小说中各自采用了特殊的纪年方式作为小说叙述的时间形式。范稳以彝族的纪年串连起小说的章节,而阎连科在《受活》中则以中国传统农历的天干地支年来记载小说中的历史事件。这两种纪年都是循环性的历史观,反映了中国的自然哲学精神。彝族人的“教父”毕摩独鲁把彝族人的时间观解释为季节,“人们只按太阳在天上行走的道路划分四季,制定历算”,周而复始,循环往返,生命轮回。这样一种时间观是与现代性相悖的,就像铁路修到碧色寨,碧色寨必须采用西元的时间形式,毕摩独鲁深为时间形式的改变而恐慌,因为他发现,人们“被站台上的那个法国时钟里的两根棍子,不断像被鞭子抽打着那样满地乱跑,连自己的爹娘叫什么都忘记了”。对于像中国这样被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带来了时间的恐慌,梁启超是中国最早觉悟到必须改革的知识精英之一,他就意识到了时间形式的改变将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他说过:“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现代性的时间观是一种递进的单行线,它指向未来,一去而不回头。现代性的时间观也是一种进步观,相信时间带来的是进步和发展,时间淘汰了落后与愚昧。法国人把火车开进碧色寨时,坚定地相信这一点,包括那位心地善良的露易丝医生,铁路修到碧色寨后,把碧色寨变成了一个巴黎式的乐园,但是时间更像一个魔术师,它使得“碧色寨的季节被打乱,时间被腰斩,人间的爱情结出错误的果实”,然后又让“大地重新归于宁静,万物依然按季节轮替,莺飞草长、春华秋实,错乱的时间重新归于有序”。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时间上的错误。弗朗索瓦曾得意地对普田虎土司说:“我们要给你们重新安排时间,但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最终也被时间算计了!”

范稳在云南边地碧色寨发现了一段被淹没的铁路,这也是一段被淹没的现代化历史,它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何等的艰巨和曲折。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甬温线上重大交通事故的新闻,我突然有了这样一种联想:今天的高速铁路与范稳所描写的这段被淹没的滇越铁路是接轨的,虽然二者之间相距数十年,但时间仿佛停顿了数十年,这多像是范稳在小说结尾描写的一个场景:当最后一列火车即将从碧色寨驶出时,“空留下高傲的三面钟孤独地守望着早已流逝的时间”。尽管高速铁路成为今天现代化高速度的象征,但高铁上的追尾突然让飞速的时间停顿了下来,我们有必要回到碧色寨,去看看那段被淹没的铁路,它会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在我们的时间形式中,有循环,有扭曲,有停顿,但它永远不会让我们回到从前。我们要感谢范稳,他再一次把碧色寨车站的汽笛拉响,让人们对那段被淹没的现代化不再陌生。甚至我想,如果甬温线上的高速列车在出发前听到了碧色寨车站的汽笛声,也许就不会发生追尾的灾难。

范稳的《碧色寨》,那些被历史的烟尘湮没了的动人故事,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尽管滇越铁路对我来说,并没有往昔岁月真实而亲切的记忆,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来到云南工作后,甚至也没有乘坐过一次滇越铁路上的小火车,我只是多次远远地对它行注目礼,多次听到有关它的动人传说。但作为一个铁路职工子弟,我对铁路与火车同样有着某种血脉深处的认同感。我基本上算是在铁路边长大的孩子,我的父亲年轻时就修铁路(成渝铁路),童年和少年时期也干过不少爬火车的事儿,在睡梦中时常伴着火车的汽笛和震动。那种老式的蒸汽机火车头在我的童年印象中特别深刻,红色银白的钢铁车轮,巨大的动力臂、粗犷雄壮的轰鸣和吼叫,宛如在大地上奔跑着的无所不能的英雄。按现在的孩子们的眼光看,它就是那个年代的机器侠。我父亲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但他那种铁路人的自豪经常对我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既然一个铁路人的后代当了一名作家,总得为铁路写点什么。尽管我父亲修的铁路和我现在写的铁路是多么不一样,但我还是想以这样一本书纪念他的在天之灵。

■创作谈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1910年的火车承载的历史与传奇

范
稳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2009年初,我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大地雅歌》,面临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问题。我知道在短时期内,自己将很难再在藏区题材上有所突破和超越。刚好我得到一个到滇南采访的机会。我们都知

■看小说

龙一:《恭贺新禧》

龙一的价值

电视剧《潜伏》之后,龙一成了出版界和影视界炙手可热的名字,而基于他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的评论却并不多见。实际上,龙一的文学价值在于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塑造了“文学新人”,创建了新的人物关系,从而也推动了历史观的革新: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书写历史;理解历史即理解人性、理解命运;信仰不止是抽象的精神,更是具体的现实。同时,信仰也是一种命运,它充满了偶然和必然,充满了日常和非常,充满了智力和耐力。而革命者亦是如是,他们不是“高大全”的牺牲者,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富有超常忍耐力的小人物。“革命也是请客吃饭”恐怕是龙一对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

龙一的新作《恭贺新禧》(《人民文学》2011年第8期)写的是1936年春节前,地下工作者郑三泰带着烈士遗孤回天津,为筹措建立交通站的经费与走私、暗杀扯上了瓜葛,女儿被迫做人质。杀手“二饼”令人闻风丧胆,但郑三泰却不得不一边和他同心协力,一边与他斗智斗勇。刀尖上行走的胆战心惊和庆祝新年的波澜不惊,与被迫离婚的难言之隐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地下斗争的浪花朵云。所有的元素,包括情节、故事、语言、讲故事的节奏都很龙一,惟一不同的,龙一又一次塑造了一个具有新的性格元素的女性——女儿郑嫣然,12岁的她机灵、世故、善良、狡黠。她完全可以和《潜伏》中的翠平、《借枪》中的裴艳玲共同构成龙一塑造的人物系列,女性在残酷斗争中的方方面面、在非日常生活中的日常智慧被龙一一发掘,读来令人难忘。如今,一部小说能够塑造一个令人难忘的性格,多么难得。

朱晓琳:《诺曼底彩虹》

文学与现实

文学反映现实是常识,但有很长时间,中国作家更多地琢磨“怎么写”,琢磨多了,“写什么”就成了问题。当下,文学与现实的隔膜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学与普通读者的隔膜问题,似乎异常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说,朱晓琳的《诺曼底彩虹》(《北京文学》2011年第9期)算是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有益的探索。从朱晓琳的创作谈中可以看出,她写的也是自己熟悉的现实和人,但她在怎么写上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的认知,她力图从更宽广的角度概括现实,概括人。寡母杨清芬劳作成凤,女儿高考落榜后她受别人影响,以微薄收入送女儿出国留学,后来又不得不卖房子以供女儿之需。女儿和两个家里有权有钱的同学在法国过着被留学骗子蒙骗的生活,懵懂不知未来在何处,与此同时,妈妈则在国内节衣缩食,畅想着女儿贴着“海龟”的金回国之后的美好前程。原本这是一个盲目从众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故事,既没有情感价值也缺乏思考意义,但在有限的篇幅内,小说触及到很多问题,比如中介的问题,留学中介、房产中介;比如女儿的两个同学的家庭,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中国社会的深刻问题;比如杨清芬和小老板的关系所触及的地域等级差异等等。尽管都是惊鸿一瞥,但使得整个小说富有生活的饱满充实。更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人都不是大恶大坏,但他们各有规则各有套路,贴近现实中人与人的真。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部中篇小说能做到如此,便算成功了。当然,作品人物性格的深入发展和立体化方面还有待加强。

(付艳霞)

■第一感受

重建身体与社会的关系

□李洱

在阅读孙瑜的《空心床》的间隙,我看了张艺谋的影片《山楂树之恋》,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空心床》写的是21世纪初的情爱生活,金钱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钱色交易无孔不入,主人公为生,为之死,为之浪迹天涯;而《山楂树之恋》则号称写的是纯情年代的爱情,据说这部影片还感动了无数的人,富丽堂皇的影院中甚至泣声阵阵。但奇怪的是,两厢对比,我从孙瑜的文字当中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性,一张宽大的“空心床”实际上成了灵魂的校场,那种本来可能会有的不良感觉反倒一扫而空,“窥视”变成了自审和他审,那些不安的隐隐作痛的灵魂借由孙瑜的文字令人惊叹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的平台。

如果用通常的眼光看,《空心床》写到的那些靠身体和脸蛋吃饭的人,似乎只是一些行尸走肉,与心灵毫不沾边,但是如果作家能够揭示出生活背后那个坚硬的逻辑,能够写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会走上一条如此险峻的道路;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写出他们真实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并以此呈现出他们与这个时代的复杂关系,那么它就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一部可以引人深思的作品。事实上,《空心床》不仅对21世纪初的情爱生活做了深刻的反思,而且作者竭尽全力要对这种生活进行有力的反思。放眼望去,在欲望之海上漂浮的,全是一些挣扎的灵魂。

我知道有人可能会把《空心床》与所谓的“私人化小说”、“下半身写作”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私人化小说”和“下半身写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行其道,引来无数卖点,但同时却在批评界遭致非议。就我的记忆所及,其中最重要的指责,是说这种写作剥离了小说与公共性的关系,是因私废公。这样一种指

责,其合理性当然值得探讨,我觉得理论界可能有些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但我同时必须承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相当多的作品当中——不仅是在“私人化小说”和“下半身写作”那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将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割裂的倾向。作为一种文学现实,我们看到,性和身体在作品当中仿佛仅仅是一种个体事务,性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被缩减到最简单的程度,由于身体同时成为叙事的起点和终点,所以叙事的逻辑关系也被取消了。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的语境当中,这样一种写作仍然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因为语境的变化,对性和身体的书写确实需要做出相当大的调整。

在我看来,孙瑜写作的意义就在于,她试图重建身体与社会的关系,她把性的问题放在一个消费背景下的庞大的权力网络当中重新审视。在这里,性爱是需要资金的,性爱不仅仅是两具躯体之间的生理活动,它牵扯到权力网络当中的各种神经末梢,个人性与公共经验的二元对立通过一张床被打破了,性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在这里似乎可以相互置换。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带着各自的社会经验进入这个权力关系当中,因为权力的奴役所以没有快感也要叫,又因为权力的奴役所以有了快感反而不敢轻易大叫。所以小说中存在的一个基本线索其实是快感在权力的奴役上是如何丧失的,它又是如何经由一条险峻的道路重新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感人的力量从小说中迸溅而出。

孙瑜本人从事过不同的工作,就我所知,她做过期货经纪人,做过记者和编辑,交友广泛,博闻群书,她曾经深度潜入这个时代的主要和分支,并获得了相当深刻的社会体验。所以她现在拿出这部作品,我一点都不吃惊。我期待她能够有更有力的作品面世。

■短评

理性通达的散文之美

□天乙

卜键漫淫古典文学多年,是古代戏曲和小说研究的专家,尤其精擅《红楼梦》《金瓶梅》。举手投足颇具旧式才子的古风,字里行间常见学者为文的雅骨。

卜键散文的语言风格以韵律之美最为显著。文白夹杂,读来错落有致、琅琅上口。虽然整体的抒情风格含蓄而舒缓,但节奏的起伏赋予从容以动感,动静形成张力,很有树静而风不止的美学效果。

卜键的文章有一种能力,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之处表达得意味深长而又通脱开朗。

卜键的文章有一种能力,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之处表达得意味深长而又通脱开朗。

卜键的文章有一种能力,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之处表达得意味深长而又通脱开朗。

卜键的文章有一种能力,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之处表达得意味深长而又通脱开朗。

一生不灭的追求理想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质,这固然与今天散文时代的生存环境时有格格不入,但却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底色和良心。我一直对这一代人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动荡总比安静能够挤压出更多的人性,也会在人性中留下更多的脉络。他们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最全面也最深刻地展示了动荡年代的风貌图景以及后续岁月的生命历程。

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卜键却是温和的。他的文字也经常提及过去的苦难,包括流离、饥饿、贫穷,却绝少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只是冷静的叙述,却自有重量。其中有宽容,“很久很久以后,我偶然还会忆起那场刻骨铭心的饿,还会寻思大伯为何不让我吃那些倭瓜和饼子。那是一个很多人吃不饱肚子的年月,那年月最好的待客方式是拿出一些吃的,可你若真的吃了,主人就会有可能付出饿肚子的代价。当终于想明白后,我理解了大伯的仁厚与善良,也彻底化解了对他的误会。”有乐观:“记得曾用一元钱买了一支竹笛,临晚向月与小弟轮流吹起,吹的是《东方红》之类革命歌曲,算是一种乐趣。又有哪个时代能完全摒弃欢乐呢?”还有苦难者将苦难作为财富的骄傲……

这样的文字会让你相信,他一直就是这样平静地接受着,在不慌不忙中保持刚强。

这种冷静应该与作者的职位与身份有关,但决不仅仅是身份决定论这么简单。深层原因是,这个群体中的优秀分子早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代表着社会的评价体系。理性、平衡、秩序是他们呈现给社会的整体面貌,并最终成为主流意识。转化为文字,就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冷静和渗透纸背的力量感。